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古代中国与海外

主编 王绍普 罗青

陶卫全 全之平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03
8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王绍曾 罗青 主编

古代中国与海外

陶 雪 金之平 著

●
山 东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印张 95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28—0901—3/G·750

定价 1.45元

出版说明

近几年来，国内文化界对编写“中国文化史”引起普遍重视。许多专家、学者在讨论如何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要广泛深入地宣传、介绍我国五千年灿烂的文化，来激发青年的爱国主义热情，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我们这套《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正是基于这样的设想而编写的。

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曾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作为炎黄子孙，无不为此而骄傲。同时，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古老文明，都是我们的祖先长期奋斗、积累的结果；没有斗争，没有创造，就不会有悠久的灿烂文化。这就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这个光辉的传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把我们的聪明才智，无私地献给祖国，为两个文明建设，为人类文明，继续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部中国文化史，涉及到许多专门学科，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这套丛书不可能兼收并蓄，只能就文化史上较为重要、较为突出、并为大家感兴趣的专题，分别作系统的重点的介绍，大体上包括考古文物、科技发明、典章制度、图书典

籍、文教艺术、衣食住行、风俗礼制、宗教信仰、中外交流、医疗保健等各个领域。这些领域，曾有不少人进行过研究和探索，但作为普及文化史知识而编写的成套读物，过去很少有人做过，我们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我们这套丛书的特点是通俗好懂，生动具体，图文并茂。力求做到科学性、通俗性、趣味性的结合。同时尽量反映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以适应各个层次读者的阅读。这套丛书，每册一般六至七万字，将分批陆续出版。

这套丛书，在编辑过程中，先后参加工作的还有鲁军等同志。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和错误，希望在读者的帮助下得到改进。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日

目 录

一、远古时代对“海外”的朦胧意识·····	(1)
二、从大夏的蜀布谈起·····	(10)
三、张骞“凿空”与丝绸之路·····	(17)
四、佛教的传入与唐三藏西天取经·····	(33)
五、隋唐盛世的中外交往·····	(46)
六、四大发明走向世界·····	(56)
七、繁荣的两宋海外贸易·····	(67)
八、元代对外贸易的璀璨明珠·····	(74)
九、马可·波罗中国之行·····	(81)
十、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前前后后·····	(89)
十一、西方传教士与天国皇帝 ·····	(101)
十二、西学东渐与东方文化西传 ·····	(110)
十三、明清海禁始末 ·····	(123)
十四、海外的辛勤开拓者——华侨 ·····	(132)
十五、鸦片战争敲开了封闭之门 ·····	(144)

一、远古时代对“海外” 的朦胧意识

以黄河流域特别是以中下游为文明发祥地的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是相对隔绝的。它的东面是难以征服的地球上最大海洋太平洋；西南是世界上最高大险峻的青藏高原；西北是茫茫无际的万里黄沙；北面是难以逾越的戈壁荒原。尽管在这种地理环境下，或有大海隔断，或有高山阻拦，但古代中国与“海外”世界的往来，却冲破高山大海，通过陆上海上的交通纽带，绵延不绝，世代相连。

远古时代的祖先们，由于地理环境优越，文明的发展又早于并高于周边各族，遂以为自己居于天下之中，故将脚下这块土地称作“中国”，与“中土”、“中原”、“中华”等词同义，但还不是整个国家的国名。“中国”一词由局部的区域概念发展成全国性的概念，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的事情。古代中国人以为，自己生息的这片国土就是世界。汉语中有两个词语可以翻译成“世界”，一个是“天下”，一个是“四海之内”。那么，我们的祖先是从小时候开始与“海外”接触？又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除“海内”外，还存在着一个“海外”世界呢？

大海本来就是人类生命的故乡，从远古时代起，它就吸

引着人类。可是，由于大海的浩瀚无垠及惊涛骇浪，使人类畏惧它又摸不透它。不过，为了生存，人类终于勇敢地走出脚下这块土地，驶向大海，寻求“海外”之谜。

在距今7—8千年前的时候，生息在中国大陆上的古代居民们陆续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渔猎经济占相当比重。这一点可以从田野考古工作中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大量的、丰富多彩的捕鱼器具上得到充分印证。它们是些采用不同质料制成的渔钩、渔叉、网坠等。《易经·系辞下》称：“伏羲氏剡木为舟，剡木为楫”，即出现了独木舟和桨。桨的制造较易，只需捆扎起几根木头即可制成；这里说的独木舟，是将粗大的原木，用火烧烤后，再用石斧、石锛一类的石质工具剡成凹形，以增加木材在水上的稳定性，最后造出浑然一体的原始船只——独木舟。1970年代先后两次发掘的浙江余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不仅出土了6只罕见的木桨，而且还采集到一件完整的陶舟。经碳14测定，这只陶舟大约为距今7000年前的物品，这就无疑地告诉我们，我们先祖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起，就已经有可能驾舟航行在大海之上了。1976年，辽东大连沿海的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件“仿舟陶器”，由于形象逼真，使人们一看即可以辨认出它就是模拟的舟船。同时，在郭家村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各式捕鱼工具，其中主要有钩针、骨鱼钩、骨鱼叉和网坠。经碳14测定可以表明，至少在6000年前，生息在辽东沿海的古代居民已经较普遍地使用舟船从事海上活动了。

不仅如此，大约距今5—6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便将已

有的天文知识用于海上活动了。古人在当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由于昼夜交替，寒来暑往的自然节律，使人们逐渐熟悉了太阳、月亮和星斗。久而久之，他们自然地会认识到，白天太阳从东方升起，没入西方；夜晚月亮、星辰同样也是东升西落。根据这些天体的运行规律，他们逐渐具备了辨别时间和方向的能力。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郑州大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出土了饰有太阳纹、月亮纹、日晕纹以及星座图等丰富天象资料的陶器，甚至有北斗星尾部的3星。既然我们的祖先在陆地上能够根据观测天体来作为辨别方向的标志，势必可以将这种方法应用在海上活动之中。而在海上依靠天体作为判断舟船方向、位置的方法的产生，使人们可以不受约束地远离陆地海岸，向海洋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至此，中国海上交通事业的萌芽便破土而出了。

到了夏商时代，航海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海上交通事业也进一步发展。当时的航海工具已经演进到木板结构的航船。为了改善航行性能和增大载重量，人们开始在独木舟周围向上延伸的方向加装木板，木板船由此而诞生，并有了风帆。从殷墟发掘出的大龟甲和鲸鱼骨可以看出，当时的渔猎、航海活动的规模已相当大。《竹书纪年》记述了禹的八代孙帝芒“东狩于海”的活动，说明夏代已经具备近海航行的能力。《诗经·商颂》称：“相土烈烈，海外有载”，这说明早商时代，人们已能到达海中的岛屿。

进入周代后，航海活动有所发展。周武王灭商后，封吕尚于齐，山东半岛大部属齐国所有。《史记·齐太公世家第

二》记载，齐太公执政后，“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说明齐国人民已经开始捕鱼，有了海上活动。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齐国灭了东莱，其势力已达整个山东半岛。政治上的统一给经济带来了发展，也给海上交通事业创造了条件。《说苑·正谏篇》说：“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据《胶州志》载，“少海”，即今天的胶州湾，古属齐地。《论语·公冶长篇》则说孔子“乘桴浮于海”。从这些点滴记载中不难看出，北方的航海事业已经比较发达。与此同时，居住于东南沿海一带的所谓吴人、越人及夷人，亦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海上交通和航海活动的主要从事者。据《论衡·儒增》记载，“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成王之时，越裳献雉，倭人贡畅”。“鬯”通“畅”，据《周礼·春官》贾公彦疏与许氏《说文》解释，是一种用郁金香草和其它粮食相混合酿成的祀酒。无可否认，这两段文字相互印证，说明至迟在西周成王时，我国与日本便有了海上交通往来。

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海上交通事业进一步发展，不仅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有所提高，而且可能已与日本、朝鲜、台湾等建立起海上交通的联系。如《山海经·海内北经》有“南倭、北倭属燕”之称，说明燕国与日本已有了海上交往，这被认为是中日之间海上航路的正式开通。

那么，我们又该怎样考察我们的祖先，是在何时走出黄河中下游这块文明的摇篮地，开始与域外世界接触的呢？

我国古代文献中，一再提到黄帝轩辕涉流沙、登昆仑之

事。《庄子·天地篇》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黄帝是传说中5000年前中国的统治者，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宗，许多学者甚至认为他去过西域。汉代政论家陆贾所著《新语》中认为他“巡游四海，登昆仑山，起宫望于其上”。古籍中还记载了传说中的尧，曾“身涉流沙地”，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跨越昆仑山到葱岭以西的龟山，会见了西王母。所谓西王母，实际是西域地区一个崇拜虎豹为图腾的部落女领袖。据说接任大舜王位的大禹，为了“学于西王国”，也曾亲自到过西域地区。

晋太康二年（281），河南汲郡人在一次盗墓中，挖掘出战国时代的魏王墓，发现了一批简牍图书，其中包括了一部珍贵的历史书，被名为《竹书纪年》。在这部战国或战国以前成书的著作中有一则记载：“汤……诸侯八泽而来者千百国，奇肱氏以车至……。”这一记载表明，在商代，也就是公元前16—11世纪，中国与“海外”的交往就已不再是想象，已有“千百国”往来。当然，这其中大部分还只是中国域内各国，但如“奇肱氏”，却已是域外之国。《述异记》一书中说，奇肱国的人非常机巧，能做“飞车”，乘这种飞车可以随风远行，商汤时，西风吹奇肱人乘车至豫州界。意大利人艾儒略在其《职方外纪》中考证，奇肱国在今意大利南部。若果真如此，就是说早在公元前16世纪，中国便与遥远的欧洲大陆有了交往。

西周时期已经和葱岭以西的民族有了来往。周成王（前1115—前1079）时，其势力向西北地区伸展，四邻民族都

来朝贺，使这一时期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出土的陶鬲、青铜戈、簇，都和西周中原同类器物相似。周和新疆天山南北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汉族的移民也到达了葱岭以东地方。甚至从那时起，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已从葱岭东西的游牧民族那里学会了养马和单骑。《诗·大雅·緜》中有“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的记载，走马即是单骑。

到周穆王时（前1001—前947），犬戎势力扩张，阻碍了周和西北方国部落的交往，于是，穆王西征犬戎，“益国二十”，打开了通往大西北的茫茫草原之路。传说穆王从此开始向西巡狩游历。成书于战国时的《穆天子传》，更详细地记载了周穆王游历西域地区的情景。周穆王是周昭王的儿子，名姬满。当时，“西极有化人来，反山川，移城邑，入水火，贯金石，千变万化，不可穷矣。王敬之若圣，筑中天台以居之”^①，这大概是说穆王见到西极的化人之后，萌发了去西方的念头。所以，《穆天子传》共6卷，其中5卷是写他驾8匹骏马西游的事迹，记载了西域的景物。如周穆王“至于群玉之山”，这里几乎见不到花草树木和鸟兽，“天子于是取玉三乘、玉器服务，于是载玉万只”^②。昆仑山北麓由东而西都是产玉之地，穆王在这里大量采集玉石，并将这些玉石运到了中原地区。

周穆王西行经过的路线是自宗周（即今天的西安）出发，北上井陉，循滹沱河至内蒙，向西渡黄河至乐都、西

①②《列子·周穆王篇》。

宁，然后经大积石山上溯黄河之源头，经过今天新疆各地，登和田西南之昆仑山（古人误认为黄河之源在昆仑）。又沿叶尔羌向北，到巴基斯坦的瓦罕，回到喀什然后东归。也有人认为他曾到过今中亚锡尔河附近。但多数中外学者认为周穆王在翻越了帕米尔高原后，一直到了吉尔吉斯大草原。如沈曾植在他的《〈穆天子传〉书后》一书中就进行了这类考证。

周穆王西行中曾宿于昆仑，看到了黄帝的宫殿，还在西王母处作客。穆王到中亚去会见西王母，显示出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决心与河西走廊西端及天山南北各族人民确立经常往来，打开天山南北的中西交通，发展通商关系。公元前10世纪以后，中亚细亚各族人民和我国西北地区各族人民之间已经建立了比较牢固的联系，彼此在经济上、文化上有了交流，新疆玉石的成批东运和中原地区丝绢、铜器的西传均说明了这一点。这也告诉我们，大约在公元前900多年，中国与“海外”的交往就开始了。范文澜先生认为，如果当时没有打开通往西方的道路，周穆王作为一个天子是断断不会冒险远游的。

波斯诗人费杜西（Firdusi）在其《帝纪》一书中，记载了古代波斯与中国的交往。其中谈到波斯的哲姆锡特王曾娶马泰国王马汗之女为妻。有些学者认为马泰国王马汗即周太王亶父。而《穆天子传》中记有“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璧臣长季綽于春山之虱，妻以元女。”这里的“长季綽”即波斯王“哲姆锡特”的不同译音，这与波斯所记相一致。唐代大和尚玄奘所写《大唐西域记》中，在“羯盘陀

国”一节里，也记有波斯国王迎娶中国公主为妻的故事。这就进一步说明，西周时期中国与中亚各国已有了商业贸易、交通往来，甚至有了国家间的通婚。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这首广泛流传的民歌中的“九州”，在我国乃是两个概念。一是传说为大禹治水后所划分的9个行政区划，但夏、商、周三代实际并没有实行过。“九州”之名自古说法不一，以《书·禹贡》的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虽属假托，但它着眼于全国，因此后人常用来代指全中国。另一种说法是战国时齐人邹衍提出的所谓“大九州”概念。邹衍，也记为驺衍（约前305—前240），是战国末年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他曾游历魏、赵、燕等国，著有《邹子》等书，现已失传。但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述了他的见解。邹衍认为世界是由大洋（大瀛海）所环绕，为内海（稗海）所分隔的9块巨大陆地组成，这就是“大九州”。每个大州又分为9个次一级的州，总共为81个次州。中国属81个次州之一，名叫“赤县神州”，简称“赤县”或“神州”，后人遂以赤县和神州作为中国的代名词。邹衍还列出神州的名山大川、珍奇禽兽、海河水产等，他推断以上这些都是其它“州”所没有的。即是说，在中国之外还存在着其它国家。邹衍的这一“大九州”说表明，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我国人民便有了朦胧的“海外”意识和欲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愿望。这大概也是我国较早的有记载的对海外的朦胧认识，也符合人类早期的地理概念。

除“大九州”说外，当时还有“四极”之说。《吕氏春秋·有始览》中称：“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这是小四极之说；同时又称：“凡四极之内，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九万七千里”，这便是大四极之说。大四极是小四极的49倍。当时的人们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之外还有着广阔的世界。

我们的祖先已经认识到，中国的西北有高山，东南有大海，高山与大海之外，还有土地、人民。山，即指昆仑。约成书于战国以后的《山海经》称：“昆仑之丘，是实唯帝之下都”，有9个门，有“开明兽守之”，神陆吾和西王母居住在里面，凡人是上不去的。《山海经》尽管被世人当作“古今语怪之祖”，把其中许多记载当传说来看，但它的记述与当时西域的实际情形是大致相同的。众所周知，昆仑山在青海，但当时这个概念则代表了“海外”西方最远的地方。《山海经》的出现，说明我们的祖先已经注意到中国以外的地理情景，其一是意识到世界之大，非“中国”所能包容；其二是意识到“海内”与“海外”存在着某种联系。

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大九州和大四极底想像……一种向域外发展的企图，一种对于异域景物的热望。这不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它实在象征着一种打开世界壁垒的努力，它在预告一个将要来到的新的时代之一面”^①。

^①白寿彝《中国交通史》，第48页。

从远古时代到战国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的祖先无论从行动上还是从观念上都在试图探索中国以外的世界，尽管这种对“海外”或域外世界的认识尚处于朦胧状态。从历年出土的文物也说明中外交往的悠久。考古学家认为，新石器时代中国使用的“鬲”出现于中亚细亚；商代的马头刀、马具也带有中亚细亚文化的痕迹；苏联外贝加尔湖附近出土过中国的古瓶，据认为是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制品。这些实物从侧面证明了历史文献的种种记载所具有的真实性。

二、从大夏的蜀布谈起

如果说，前面我们谈到的远古至夏、商、周时代的中外关系中还有一些只是传说，或者只是个别行为的话，那么，战国后期到秦汉时代，中国与海外许多国家都有了交通往来。

曾经有人认为，张骞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往来的开拓者，其实不然。《史记·大宛列传》在记述张骞出使西域时曾这样描述：“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东南有身毒国。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而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

不远矣”。

大夏，音译为巴克特里亚，在今阿富汗北部。而身毒，原音为Sindhu（一作Sind），在印度北部。张骞到大夏的时候见到的中国四川产的“蜀布”，是一种细麻布，是从身毒由商人贩运去的。这说明，远在张骞之前，中国与印度的商人已在进行贸易了。另外，据王嘉的《拾遗记》载，周成王时期，有旃涂国、祗因国、燃丘国来献方物；老子撰写的《道德经》中提到有浮提国人相助；《庄子·山木篇》里记有建德国。这些一般认为都是古印度的一些国家。所以，张骞见到中国的蜀布经印度传入大夏这一事实，是可信的。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五记载，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沙门室利防等一十八人来自西域。帝恶其异俗，以付狱。俄有金刚神，破狱门而出之。帝惧，即厚礼遣之。时国事区区，弗克敬奉。”据认为，“室利防”为印度人名，是秦朝时从印度来的僧人。中国的秦朝时正值印度的孔雀朝，其阿输迦大王奉佛，曾遣僧人到邻国传播佛教，所以，到中国来是很可能的。

印度古文献也记载了与中国的往来。莫可基的《印度航业史》中说：“有证据可使吾人信公元前第7世纪及第6世纪，印度与巴比伦有海上通商之事，尤以前第6世纪为盛。商业大半，皆操之达罗毗荼人之手。阿利安人亦有营商者，唯不众耳。此后印度商人有家于阿拉伯及非洲东岸者，同时印度商人亦有家于支那海岸者，其在巴比伦有居留地，可无疑也。”古代，印度已称中国为“支那”。印度的《菩提萨

忒瓦瓦达那喀尔帕拉塔》一书中，记有印度商人曾向国王诉说他们在海上运送货物时，被“那迦人”海盗所劫。考据家认为这里提到的“那迦人”，即为中国人。莫可基进一步证实，当时的印度，西与希腊、罗马、埃及，东与支那以及东方诸国，俱来往频繁。

秦汉时期，天下大一统，国势强盛。面对茫茫无际的大海，中国人对域外探索的热望更加强烈。在秦统一中国前，我们祖先的地理知识，仍处于非常朦胧时期，尤其对海外的认识只能是处于传说时期，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相信海外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有长生不死之药，这使得他们迫切渴望打通与海外的联系。当然，由于航海技术及其它原因，这3个帝王的船队都没有什么结果。

秦代以来，我国海上交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突出特点便是开始与朝鲜、日本这些近邻国家进行交往，并建立商业贸易关系。秦始皇作为一位杰出的君主，不仅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而且对于海洋航行、中外交通事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一生5次东巡，3次亲临他称为“东极”的成山头（今山东荣成县龙须岛）海域。他曾命人在这伸入大海的岬角立碑，正面刻“天尽头”，背面书“秦东门”。秦始皇为什么深恋这东极疆土？恐怕是征服未知的渴求，跨海成仙的神往，亦或是对苍茫大海的折服。在巡游山东半岛时，他还曾派徐福带领规模庞大的远航船队，进行远洋航行。这些活动虽与秦始皇的迷信有关，但它客观上促进了海外交通事业的发展，传为中外友好交往史上